

· 人物与书林 ·

慧眼识珠启宝藏 大师谈心遗佳酿

——写于《胡适王重民书信集》问世前

王锦贵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回顾了胡适和王重民两位先生对北京大学和国学研究的贡献, 及二位在工作和学术上的交往, 认为台北胡适纪念馆即将出版的《胡适王重民书信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可启发年轻人重视传统经典文献的学习。

关键词: 胡适 王重民 书信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2-0123-05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ublishment of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Hushi and Wang Zhongmin

Wang Jingu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Reviews the efforts of Hushi and Wang Zhongmin to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ir intercourses at Peking University. This book,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Hushi and Wang Zhongmin, will be published by the Hushi Museum, is considered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which can enlighten youngsters to devote much attention to study traditional classical works.

Key words: Hushi; Wang Zhongmin; letters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2-0123-05

2006 年。愈是年末岁尾, 头绪也愈多, 教学以外的一些事情, 也就无暇顾及了。有一件事则属例外。金秋 10 月, 王平先生偕同海峡彼岸的蔡登山先生大驾光临, 并带来一则讯息: 台北胡适纪念馆拟于近期出版《胡适王重民书信集》, 希望敝人做些宣传。由该馆彭靖媛女士来函获悉, 在他们目前整理的书信中: 胡适致王重民信 104 封, 王重民致胡适信 135 封。众所周知, 如今《胡适书信集》的出版已不止一家, 但无论是黄山书社本, 还是北大出版社版本, 尽管无一例外的都有胡适与王重民的书信, 而像台北胡适纪念馆所规划的那样, 最大限度的、专门的将胡王书信汇为一书, 并且延聘专家校勘、注释, 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可谓独具慧眼, 可喜可贺! 作为从人品到

学问都深受王先生影响的弟子, 能有幸为此添砖加瓦, 何止天经地义, 光荣之至, 还因为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驰名天下两先贤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放眼中国历代文化领域, 可谓人才辈出, 前赴后继, 胡适与王重民就是 20 世纪我国文化领域中极有影响的两位代表人物。

胡适 (1891—1962), 原名胡洪马辛, 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1910 年留学美国, 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1917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教。曾经参加编辑《新青年》, 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称于世。一生涉猎范围广泛, 在

王平, 敝人多年好友, 尊敬的国学大师王重民先生之子。

蔡登山, 台湾台南人, 淡江中文系毕业, 历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及电影公司企划经理等。开探索作家心灵风气之先, 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 荣获教育文化电视金钟奖。出版著作多部。新作《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与王重民论水经注》, 近期发表于《国家图书馆馆刊》。

收稿日期: 2007-02-02; 责任编辑: 王景发

史学、文学、哲学诸领域均有丰富著述，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1962年在台北病逝。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受直系军阀通缉，遂易名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重”之义，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北海图书馆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1934年受教育部委派，到西方许多国家搜集与研究我国流失海外的图书资料。1947年回国，历任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副馆长，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学系主任等职。1975年遭“四人帮”迫害，不幸逝世。

苏子尝言，古代非常之人，“必有过人之节”。^[1]20世纪的胡适与王重民，也有“过人之节”。其“过人之节”自然不是苏氏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胡王两位之异于常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最大的共同点上。

（一）教育领域两功臣

说来巧合，胡适与王重民两位先生是学界挚友，都曾长期从事过教育，并且都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尽人皆知。他1910年赴美留学，最初学农学，后来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哲学。1917年毕业回国。在由此以降的岁月里，胡适先后三次执教于北大。第一次是1917—1925年，第二次是1935—1937年，第三次是1946—1948年。在长达17年的任教岁月中，他所做的三件事永远铭刻于北大的历史里。胡适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讲授了许多课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文学、英文修辞学、欧洲文学名著、中国名学、中国小说、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课程之外，又有诸多讲座；胡适先生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担任了许多行政工作。第一次来北大，他先后担任了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教授会主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委员、教务长、评议会评议员等职。第二次来北大，他先后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第三次来故地，北大已经是拥有文理法农工医，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作为一校之长的胡适，这次上任伊始，便任命了各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还制定了在北大建立全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计划；胡适先生所做的第三件事是，为北大网络人才。尤其在二进北大的时候，正值本校惨遭军阀蹂躏，元气大伤。由于胡适的竭力推荐和引进，不仅在当代学界名流中聘任到了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余平伯、魏建功、梁实秋、闻一多等文科教授，还请来了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理科教授。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派来飞机催促胡适南迁。他在匆忙离别北大时，还特别留下便笺，谆

谆告诫同仁汤用彤、郑天挺：连接几个电报，只能“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2]胡适一生与北大的情愫，由此可见一斑。

王重民与北大的密切联系，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与北大的联系，乃是并不连续的三个时段，而且后来永远地离开了北大，终老台北；而王先生自从进入北大后，再也未曾离开一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王重民教授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始人。他于1947年初从国外回来，被聘为北大中文系教授。不久，即开始在中文系附设图书馆专修科。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图书馆专修科于1949年成为独立建制，1951年由专科升为本科，直至后来研究生方向的最初建制，都凝聚着王先生的诸多辛劳与智慧。他不仅制定教学计划，延聘名师，还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亲自开设了许多课程。凡他开的课程，一般都编有讲义，常常是边写边讲，不辞劳苦。先生先后讲授的课程有：1、“中国目录学概论”，这是学习目录学的入门课；2、“目录与书刊评介”，这是书目与书评相结合的专业课；3、“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这是对早年“中国工具书使用法”内容进一步扩充的课程；4、“普通目录学”，这是一门采用前苏联课程名称，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专业课；5、“目录学引论”，这是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基础的专业课；6、“中国目录学史”，这是从“普通目录学”里独立出来的一门专业课；7、“历史书籍目录学”，这是以中国历史文献为基础的专科目录学。先生讲课兢兢业业，自具特色。诚如朱天俊教授回忆中所说，他“从不照着讲义讲，而是讲重点、难点，讲近期研究心得。例如，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及补志记载图书范围的差别及缘由；古代重要书目中提要编写体例演变及过程等等，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启示后人之所思”。^[3]毋庸置疑，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史上，王重民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国学领域两大师

胡适与王重民两位先生都是后人敬仰的国学大师。

胡适先生从学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其一生。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热心于文学的改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学革命由此引发，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五四时期，胡适以高涨的热情，连续撰写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多篇文章。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胡适还亲自进行了创作“尝试”，他的《尝试集》可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具有实验开拓之功。毋庸置疑，胡适堪称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之一。1919年胡适还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发其端，从此改变了他自己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思想理念。胡适1920年离开《新青年》杂志，创办了《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

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又与蒋廷黻、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等等。上述刊物大都属于政治性刊物。胡适先生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工作,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遗憾未及结集定稿出版。

纵观胡适先生的一生,尽管在其生命旅途之每一阶段,似乎都能引发人们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疑点,诸如他的博士学位问题,西洋哲学素养问题,与现代政坛大人物的影响和关系问题等等,但是他作为20世纪著名学者的地位则是无可置疑和不可动摇的。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史学、文学和哲学领域,并且都有很突出的建树。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4集)等。虽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同样如此,但是这两部书都属于该领域该学科中的基础性经典著作。此外,值得一提的起码还有两点:一是在学术领域里,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二是他倡导的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研究中国章回小说等等,也都具有开一代新风之功。

王重民先生不仅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而且硕果累累,卓有建树。他的好友傅振伦先生在回忆录中曾经说过,还在北京读书期间,王重民先生就曾发下宏愿:“尝闻古人愿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愿读万种书。”^[4]王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七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以扎扎实实的社会实践,在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他不仅是现代蜚声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还是腾誉学林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纵观王重民先生的一生,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重要领域。

第一个重要领域是图书馆学、文献目录学方面的研究。先生在这一领域里的著述之丰令人惊叹。首先,他相继出版了《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冷庐文藪》两种文集,出版了搜集于海外的太平天国史料、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译著,以及徐光启著作的整理研究等等,都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其次,在中国目录学史领域里,推出了自己的《校讎通义阐释》和《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其三,在古籍题录方面劳苦功高,代表作是《中国善本书提要》和《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这是王先生在系统调查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三馆中文善本的基础上,撰写出的5620篇提要的结集。这些提要详细记录了古籍版本的特征、作者、编校者、刻工等情况。第二个重要领域是索引编纂方面的研究。他先后主持编纂和参与编纂的成果主要有:被誉为三、四十年代“三大索引”的《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和《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以及囊括了中外近500种论著的《老子考》等,都曾长期在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个重要领域是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于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两方面,次

第出版的成果主要有:1958年的《敦煌古籍叙录》、1957年的《敦煌变文集》、1941年的《敦煌曲子词集》、1963年的《补全唐诗》、1962年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及1984年的《敦煌遗书论文集》等等。总之,“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5]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003年适逢先生百年诞辰,北京大学师生特别举行了一场大型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了70多万字的《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用以隆重纪念20世纪的这位学界泰斗。

二 遗训遗风育后人

胡适与王重民两先生同为后学效法的典范,他们的优良文风和治学态度在其来往书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钦佩,也令人感动。

两先生交往深厚,往来书信尤以20世纪40年代为多。在那个时期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世界,你来我往,鸿雁穿梭,书信成为两人学术交流的基本载体。在那个时期里,无论是讨论古代人物,还是研究近代事件,两人同苦同乐,心心相印,切磋讨论,灵犀一点。即便在意见与观点相左的问题上,也往往能推心置腹,求同存异,彼此互进,终达共识,体现出亦挚友亦大家的光彩风范。胡、王书信可谓赏心悦目。每每阅读其信件,细细品味前辈文字,恍如缕缕春风袭来,令人敬仰,亦令人震撼:何以我辈未曾想或虽想而极肤浅之问题,在前辈则细如发丝、环环入扣,甚或一语中的?大师笔端之启人心智,堪称醍醐灌顶。

在两大师来往的书信中,有关《水经注》的讨论可谓经典。众所周知,胡适先生对郦道元《水经注》版本极感兴趣,晚年曾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而说起胡适先生这一学术情结,还是根源于其时同在美国的王重民先生。1943年11月5日,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工作的王重民,撰写了长篇论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6]。全赵“两公案”,然后寄给身在纽约的胡适先生。胡适阅读后,不敢苟同王重民意见,当晚半夜一点,即写信回复。与此同时,还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平生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过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翻此案。”^[6]这是胡适涉足《水经注》版本研究的起始,也是胡王两人深层切磋这一公案的开端。

阅读两人以后你来我往之书信,笔者肤浅心得有三:第一,可以直接从中聆听前辈治学经验。例如胡适在1943年5月30致王重民书信中,细说宋代学者李若谷“勤、谨、和、缓”的考证方法:“‘勤’即是来信所说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小识大,都可有所成就。‘谨’即

是苟且，一点一滴不放过，一丝一毫不了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和’字，我讲做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我说‘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上只是从容研究，莫勿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英文的 suspension of judgment，即是暂且悬而不断——凡不肯悬而不断的人，必是不能真做到勤、谨、和三个字的。^[7]又如王重民是著名的版本学和校勘学家，胡适在考证《三辅黄图》之“太学”一节时，曾深得王氏之助，因而极力赞扬“谨遵先生所论校勘之义，用宋本、明活字本校鲍本，再以《艺文类聚》所引者校之”云云。^[8]第二，可以从中看到大学者“服从证据”和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本来王重民对《水经注》案的看法与胡不同，但经过反复研究，王重民对胡适观点心悦诚服，他在1943年1月31日去信中说：“读过先生这五篇大著，只觉得满纸温温和和，切切实实，一步一步的令人不自觉的去尊信东原的学力和精诣，绝无窃书之事，轻轻松松的便把王、孟诸公的成见，置诸九霄云外了。王、孟诸公若在，读了这几篇文章，至少可以清凉许多，也许他们的成见，同时也被先生的温和切实融化了。”^[9]而胡适也从王重民来信中受益匪浅，诚如1944年1月17日致王重民信中所说：“此一周之中，老兄的指教最使我得大进益——当然，最大的得益，是老兄指出赵怀玉四十九年刻的《四库简目》已有赵书一事。此事使我明白许多相关事项。多谢多谢。”^[10]又如此前胡适在考证《易林》时，要证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崔氏《周易林》’与‘焦氏《易林》’属于同一种书，而非‘焦氏与崔氏各自为书’，王重民从唐赵璘《因话录》中为其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铁证’材料，胡适为此喜出望外，1943年4月10日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王重民，“意在拜谢‘东风’之赐”^[11]第三，还可以从中体味到大师们在学术交流中的深情厚谊。为了帮助胡适重审《水经注》案，王重民先生先后付出了许多艰苦劳动。他不仅从学术上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之商榷，还经常为胡适搜集必要的珍贵图书，甚至请自己的夫人刘修业女士为胡适先生誊抄过许多资料。对于此种友情，胡适先生屡屡言及，感激莫名，乃至书信末尾多有“匆匆敬问双安”、“匆匆敬祝双安”之语。1943年10月14日，胡适先生甚至在日记中写道：“在纽约作考证文字，无人可与讨论，故我每写一文，就寄于王重民兄，请他先看”。^[12]

《胡适王重民书信集》的即将推出，也有特别的典型性、现实性、及时性和针对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文化教育领域形势喜人，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科研成就硕果累累。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下，负面现象也有目共睹：学术界、教育界里，功利

色彩日益突出，躁动不安情绪甚嚣尘上，物欲横流“光顾”各个角落，“坐冷板凳者”甚至被讥讽为“傻子”。为了捞取名利，一些人视学术道德于不顾，不以弄虚作假为耻，反以剽窃抄袭为能。在这些事件一次次曝光和浮出水面的同时，学术道德问题便一次次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行政措施以制止不良现象，固然无可厚非，但全面深入的进行优良学风教育，尤其努力做些“未雨绸缪”工作，才是“正本清源”的根本性举措。《胡适王重民书信集》的即将面世，可谓雪中送炭、功德无量。如此评论，既不是夸大其辞，更不是信口雌黄。笔者以往也曾常年与传统文献打交道，并且也很喜欢郦氏《水经注》，惜乎对《水经注》公案之细微末节不甚了了。近日拜读台北蔡登山先生寄来的大作《要把金針度與人——胡适与王重民论水经注》，可谓先睹为快，获益良多。这篇论文因蔡先生的“穿针引线”，不独清晰地再现出《水经注》案的来龙去脉，在一封封书信构筑的学术平台上，似乎也清晰的演绎出两大师对座谈心的幅幅画面。读了蔡文，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两大师的敬仰，也使我对“书信集”的即将出版更加看好。“书信集”是国学大师深层学术交流的典范，是后学提升研究能力、汲取丰富营养的宝库，也是文化界、教育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的好教材。

三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子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恬淡幽雅，却揭示了“源头活水”的极端重要性。反思胡适与王重民学术地位的形成，重视经典学习以夯实国学根基，恐怕是两大师一路走来最重要的“源头活水”。基于以下三种原因，我们这些后学们是否也应该像前辈那样，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学习。

第一，为了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努力学习经典文献。中国传统文化不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是全世界各民族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空间断层的文化体系。而中国经典文献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包括胡适、王重民在内的由古及今的大家们，无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因此，学习经典文献，特别是学习一些中国的经典文献，决非阅读一两本书、熟悉一点历史知识的问题。经典文献是先人们用艰苦劳动凝结而成的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并经过一定时间考验的辉煌成果。它们虽然只是整个文献家族中的极少数，但其文化价值之大，远非寻常文献可比。经典文献在知识的包容性以及时间、空间、读者群体等各个层面，具有极大的典型性。换言之，经典文献具有四大特点——知识的常新性、时代的连续性、空间的通畅性和读者的广泛性。试以知识的常新性为例：通常情况下，即使较好的作品，甚至于时下热炒的畅销书，人们也不会反复的一读再读，因其内容早就一览无余而呈现苍白。许多书所以曾经“畅销”，主

要是迎合时尚,但能够“迎合”一时,却不能“迎合”一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畅销书”或径直淡忘为过眼云烟,或为强弩之末,难逃“落伍”厄运。经典文献则是另一番景象:它们或许是几百年、上千年乃至于更久远的作品,但这些著作历经“大浪淘沙”,内容深邃精湛,反映了人类社会深层次的东西,因此总能“与时俱进”,总能在各类人群的心灵中产生火花,爆发共鸣。也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阅读这些著作,总能常读常新,总能感受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巨大魅力。^[13]

第二,即便要想终南捷径地从《胡适王重民书信集》中汲取营养,也必须学一些经典文献。“书信集”再现了两人“躬行践履”的治学路径,属于较深层次的学术平台。但凡耐心阅读,往往能引人进入一种愉悦会心的胜境,“胜境”之妙,酷似佳酿之尘封初启,醇香四溢。然而这种“胜境”展示的画面,既不是人尽可阅的连环画,也不是少年儿童“启蒙书”,乃是大师学术交流中的“心灵火花碰撞图”。如果没有起码的经典文献知识,就只能是“雾里看花”,“望梅止渴”。而如果具有一定的经典文献功底,必会真真切切地看得明白,甚至会“心有灵犀”地从中汲取难能可贵的高级养料。这是因为,大师们的治学已经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他们往往是既能入乎其里,又能出乎其外。因而,即便是“书信集”中看似并不连贯的“只言片语”,由于特定环境下大师们“四两拨千斤”的点拨,也会使人豁然开朗,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受。足见,要想从前辈大师身上学到真东西,阅读和学习一些经典文献实在是必要的。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文献重放光辉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使我想起王京山博士近年在网络出版机制中提出的“自组织”^[14]理念。所谓自组织,可以理解为,某系统不受外界干预而能自行调节、自我组织的过程或现象。自然界、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自组织现象”:自然界系统,地理环境系统,人脑系统,人体系统等。在笔者眼里,文化领域有时候似乎也有“自组织机制”,就像经济领域中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汉代司马迁“低流之水”那样。因此,似乎不必过于忧虑时下所谓另类现象:网络世界里“吃快餐”者越来越多,斗室中读经典“坐冷板凳者”越来越少。君不见一个更加成熟的时代已经到来:科学文化领域里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综合化趋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典型,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国民的综合素质培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强调。因此有理由认为,古代学人没有经典文献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活于信息时代快节奏中的国人没有几部经典垫底,就没有底气。道理也极简单:经

典文献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精神财富。通过学习经典文献,可以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能够坐收一举多得之效:不仅能从中学到许多耐人寻味的至理名言和座右铭,不仅能从中学到许多开阔视野、弥足珍贵的辩证思想,不仅能从中学到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还能从中领悟到加强自身修养、升华品味境界、提高文化素质的人生真谛。

在《胡适王重民书信集》即将问世的前夕,我想表达两个心愿:第一,台北胡适纪念馆整理出版这部集子,可谓慧眼识珠,功在当代,由衷兴奋并致以敬意;第二,胡、王两大师虽早已驾鹤西去,但由这部集子折射出的道道光芒,胜似陈年佳酿,唯愿琼浆喷涌,遗泽百代。

参考文献:

- [1] 苏轼.留侯论[A].刘盼遂.中国历代散文选[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273.
- [2] 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先驱胡适[A].萧超然.巍巍上庠,百年星辰[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4.
- [3]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编.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4.
- [4] 傅振伦.王重民别传[A].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8.
- [5] 白化文.冷庐文薮·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6] 胡适著.曾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10册)[C].台北:联经文化出版,2004.
- [7] 胡适著.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03.
- [8] 杜春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4.
- [9]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C].合肥:黄山书社,1994.
- [10] 胡适著.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51.
- [11] 杜春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60.
- [12]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七)[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41.
- [1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子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90.
- [14] 王京山.网络出版运作[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158.

作者简介:王锦贵(1946-),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古典政经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将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喻为“看不见的手”,主张经济自由,不受外来行政干预。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近人或将“若水之趋下”说成“低流之水”。